

貫蘇

于新

洋

葛新詩文選

葛新著

葛新真名葛闊福籍
州，一九四四年生
舊社會交替的十里
場——上海，從他

的一出生，就飽經了時代的憂患。童年、少年、青年時期，是在社會主義紅旗下度過的，目睹和經歷了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和階級鬥爭的風風雨雨，特別是在劃時代的慘劇——文化大革命，煉就了他堅毅不屈的性格，豁達奮鬥的人生觀，敏銳機智的思想和洞幽燭微的嗅覺，使他來港后十年多的時間里，獲得了商場及文學事業上的



葛新诗文选

葛新 著

海外华人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苗 育

封面设计：尚 美

葛新诗文选

葛新 著

海外华人作家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环文咸东街 89-93 号文乐商业大厦 6 楼 A 座

香港天地书店发行

香港泰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16

字数 14.5 万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第一次印刷

印刷 1-5000 册

ISBN962-785-056-2

定价：港币 48.00 元

自序

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今社会，人人忙于钻营，攫取，获利，而我却执着地去追求著书立说，不少人摇头叹息，无法理解；

在这纸醉金迷的当今世界，人人都沉醉于感官的享受，美女和香槟的体验，而我却迷恋于写作编书，不少人连连劝说，却难以说服……

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芸芸众生，这是绝大部分人，追求的是物质；第二种人，属比较高尚的，如作家，艺术家，教育家，追求的是事业，追求的是精神，但目前在中国，第二种人不少成了第一种人。第二种人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几十年如一日，执着地追求他们赖以寄托的精神世界；第三种人是最高尚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理想和信仰，如当年的共产党人，虔诚的宗教徒。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无所畏惧。“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革命的诗句曾激励过青年时期的我，去奋斗、去献身。我有位朋友从香港移民美国之后，献身宗教，成为牧师，他把所有的上亿财产捐给了教会，分文不留，这是为信仰而活着；第三种人目前社会极少，又可说凤毛麟角，目前在中国社会，第三种人还被视为傻瓜；目前的中国官场，弥漫着贪污腐败，及时享乐；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我一九七九年赴香港定居，为让妻儿生活有望，为让父母安度晚年，我白手起家，胼手胝足，日夜打拼，终于得到了牛奶和面包，终于使我向第二种人，第三种人的征程进军中筑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从商过程中，我不忘从文，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六本著作，涉及的范畴有医学、历史、文学、商业等，

我已成功地成为了第二种人。一九九六年之后，我定居在上海，见人有难，我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找房、找职业、找生意，我都会帮一把，送一程；我自掏腰包举办了中美两地的国际文化交流会，二〇〇三年初自费在港作了半个月调查，写成《拯救莘莘学子失业的阳光工程》几万字长文，提出解决学生失业的新思路，交香港董建华港特首，港府从中采纳了我部分意见；我贴钱成立了“诚德文化商务沙龙”；我自费办起了宣讲诚信的《诚德之声》报；我带头发起了对一位患重病诗人的募捐；我近期又无偿在交大、同济等大学开设讲座“路在何方——谈大学生的创业”……，在成为第三种人的征程中，我努力着，跋涉着，但步履是那么艰难，脚步是那么的沉重，前进是那么缓慢……或许我永远达不到第三种人，因为我是个凡人、俗人，我还有许多私心杂念，还有许多七情六欲。看到国色天香的美女，我还会动心；见到花花绿绿的钞票，我还会眨眼；听到他人升官发财，还会羡慕……不过，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一息尚存，不言松懈，我将始终不渝地去努力成为第三种人。拂晓前的第一缕阳光可以作证，今天《葛新诗文选》的编写与出版，就是我努力成为第三种人在征程中留下的行行足迹的明证。

(一)

我曾有过诗人的形象，诗人的风度，诗人的气质；

我曾有过诗人的骄狂，诗人的激情，诗人的遐想；

我曾有过诗人的敏锐，诗人的语言，诗人的度量；

然而，诗人同我擦肩而过，如果不是那个文化大革命悲惨的年代，如果不是喉头系着铁链的令人窒息的环境，我或许会成为一名人民的诗人，为人民的苦难而郁伤，为人民的欢乐而歌唱。为了二个孩子的前途，为了生存和发展，我离开了熟悉的土地，离开了亲爱的家乡，离开了年迈的双亲，移居香港。

为了生存，我曾先后做过厨房杂工、跟车运输工、塑料厂啤机工，电脑线路板配装工、高级餐厅的侍应生……为了发展，我成立了隆泰贸易公司，从事五金的进出口业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了在美国立足，我的身影忙碌在美国三藩市、拉斯维格斯展会上，奔波在异国他乡的大街小巷。我人生中最光彩、最丰盛的一段生命给予了从商。在港长达十多年期间，我只是应《镜报》关诺总编的盛情邀请，为《镜报》成立三周年而写了一首诗《镜报——你这沙漠中挺直的白杨》。我记得那是星期六的早晨，我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摆档开诊，在忙完了替病人量血压、针灸、推拿之后，我用了一小时，写成了这首急就篇，晚上在家中作了修改，第二天就交稿了。《镜报》是同人杂志，是徐四民先生创办的，关诺先生任总编时，我走得较勤。后来，换了几任总编，现在我有一位梁姓的大学同学任副总编。这本杂志，其政治态度对大陆是小骂大帮忙，因此被允许进入大陆发行，经济效益还不错。在香港，办文化事业是十分艰难的，要害人，就叫他办报、办杂志。

我就读南洋中学高中时，就喜欢文学，特别是喜欢新诗。当年，十二元钱的人民助学金，除了学费、书杂费、膳食费外，我总要省下一二元钱，在旧书店里掏旧的诗刊，旧的诗集。有中国诗人写的新诗集，也有外国人写的诗集，那时比较多的是俄国诗人，那时的旧诗集才一、二角一本，捧回这些宝贝，囫圇吞枣，如饥似渴地读着，也不断地模仿写新诗。少男少女总是春，春心的萌动，我曾写过不少爱情诗，那时班上有一位面容姣好的女生，我偷着给她写过不少诗，是写在破旧的练习簿上的，从没有给过她。这些诗，没有一首留下，全失散了，十分可惜。收集在这本选集中的近30首诗，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是一无是处，它们不是人性的闪光，真情的流露，而是政治的产物，是那个时代伟大号召下做出来的诗。现在发表出版这些诗，并不是孤芳自赏、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也不是向外炫

耀我的才华，而是我要展示出一个真我、一个纯真的青年如何可悲地被利用，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愚民教育使整整一代的青年分不清是与非，错与对，黑与白；从而愚昧、迷信、盲从，缺乏独立自主的思考，缺乏卓然傲立的人格。发表出版这些诗，同时也希望留下历史的若干旧貌，让人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一九六八年写就的《苏修的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背后》、《勃烈日涅夫的苦恼》、《新沙皇的“吃鱼日”》四首讽刺诗，从中可以看出我驾驭讽刺诗的熟练技巧，但这四首诗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今天看来，当年的苏联，摆脱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制约，摆脱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的人为对立，去追求土豆烧牛肉的新生活，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这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这将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和考证。

《背包》所要揭示的是永葆革命本色、继续革命的思想。放眼今天的社会，司法腐败、贪污盛行，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难以理解共产党人的变化，他们长眠地下，或许难以瞑目。而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早已觉醒，赴港定居，继而举家移民美国。《背包》的技巧是相当高的，它比起今天发表在某些报纸上的那些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诗，显然它是真正的诗。

《我们处处象大海》、《家》、《走》、《海崖赞》、《春潮滚滚劲头高》、《八亿人民盛大的节日》等诗，今天读来，我依旧被当年的激情所感动，我难以想象这些诗出自于我的手；我难以想象当年的我“左”得如此的可爱，又如此的可悲。二十余年的异国他乡生活，生活的浪花多少遍叩打过我的诗心，人生的磨难多少次刀刻过我的胸怀，如今，我有了人生的真正坐标，有了对世界的一份冷静，对政治的一份清醒。应该肯定的，在这些诗中燃烧着当年一个青年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的生命之火。

我是华侨大学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六八年被分配在内蒙一机厂，该厂是五机部属下的兵工厂，专业化生产坦克，“六

四风波“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就是我们工厂制造的。七三年因照顾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我被调回了福建，在漳州三中任教。漳州三中是百年老校，前身是教会学校。建筑带有西方的特色，校门前还有良田小湖，环境清静优雅。尽管当年“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使学生无心上学求知。由于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还是恪守尽职，乐于奉献。我学的是中文，自然是担任高年级的语文教师，由于学校教师人手不够，教师的突然病假、事假，我常被叫去当差代课。学校知道我知识渊博，人生经历丰富，人又一米七六的个头，高大威猛，压得住学生，我成了学校的万金油和灭火器。教导处通知代课往往是几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作出的，我无法从容去备课。临上课堂一边看书，一边讲解，一边板书。我曾代过政治、历史、外语、地理、甚至是体育课。这一时期诗的产量大增，《考试》、《授奖》、《红花》、《排练》、《讲台颂》、《送别》等，均是写学校生活的。这些诗篇应该说激情满怀、乐观向上。在奉行知识无用的那个愚昧年代，作者以无比的热情讴歌了教师，向世人展示了教师工作的艰辛，崇高和伟大。当然，诗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时代“左”的痕迹。长诗《生命的歌》，是我为《周恩来诗歌注析》一书所写的代序。周总理是我所敬重的一位中国革命领导人。今天，对于他的一生政治主张，我不敢苟同，对于他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由于我看到的内部资料有限，也不敢妄加评论，待历史今后作出结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人格魅力、道德力量还在感动着我。比起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贪官来，他确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和表率。他的清正、廉洁，他的务实、勤政，使他至今还活在人民的心上。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漫长而曲折；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思想，博大而精深。用诗歌的形式展示他的人生和思想，如果没有宽广而深刻的思想境界，如果没有炉火纯青的写诗技巧，是难以表现周恩来这个伟人的。抒情与叙事的结合，思想与艺术的统一，

我在长诗《生命的歌》中作了有益的尝试。

《友情》与《朋友，你在那里》是我在从商生涯中写在贺卡上的短诗，谈不上有什么艺术特色，但它是真情的流露，人性的闪光，是真正的诗。人生的财富并不是金钱，而是朋友。我讲的朋友，指的是在风雨征程中能予你关心，予你帮助的朋友。在港在美期间，每到春节，圣诞节来临，我总要印制精美的贺卡，挂历邮寄四方朋友，并在贺卡上写上一首短诗。

我已步入了中老年，人生的磨难和心路的沧桑，使我不再能激情汹涌、热情似火，我不可能再去写诗，我也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诗来。今天，市场经济，生存的需要，使我们的诗人必须为五斗米而折腰，而舆论的导向，使我们的诗人无法反映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的问题，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我们的诗坛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已没有了诗，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今天的诗坛是寂寞的。

(二)

收集在书中第二辑中的《五月南风大麦黄》、《比喻的矛盾》、《漫谈诗的描绘》、《再谈诗的描绘》四篇谈诗的文章是和孙绍振老师合写的。严格地说，文章是属于孙绍振老师的；无论是观点确立、中心思想提炼、段落安排，均是孙老师一手策划的。我无非是对他的谈话作了记录和整理，然后成文而已。我把上述四篇文章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目的，并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一位将被人遗忘的技巧诗人和天才的诗歌理论家。作为诗人来说，孙绍振的写诗技巧，迄今为止，目前中国的诗坛上，我还看不到有哪一位诗人超过他。当然，他的诗，由于时代的限制、舆论制约，他不得不写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盛世的应酬诗，很少见到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披露，也很难读到他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不平之声。

他写的悼念周总理的一些诗，有思想，有真情，有技巧，感人至深。一个诗人，如果不能反映人民的疾苦，不能传达人民的呼声，即使他的技巧再高、再好、再成熟，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绍振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只是一个技巧诗人。作为诗歌理论家、评论家的孙绍振，我可以这么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懂得诗、理解诗、驾驭诗，能揭示出写诗的规律，总结出技巧和方法。他是中国第一个能把写诗变化成一种具体操作。我曾经读过无数本谈诗创作的理论书，但始终无法掌握到诗歌的技巧和方法。但他的诗歌理论，使你从一个不懂诗、不会写诗的人掌握了他的方法之后，即刻变成了一个诗人。当年，我写的诗，十分普普通通，时好时坏，但在接受了他的诗歌理论之后，我即刻在写诗技巧上有了个飞跃，成了有点名气的诗人。我的《背包》、《手册》、《红花》、《讲台颂》等诗，完全是按他理论去“制作”成诗的，获得了好评。他诗歌理论的内容浩瀚丰富，这四篇文章只不过是理论的小部分而已。他在诗歌技巧方面的操作性上，提出：形象+典型环境典型细节。例如“春天来了”并不是诗，“春天悄悄地来了”，“悄悄”两字，有了动感。“春天悄悄地走来了”一个“走”字，有了形象；再找一个典型细节，融化的雪水或柳树的嫩芽，这初春固有的环境细节，由“春天来了”这极一般的叙述句变成“春天悄悄地从柳树的嫩芽上走来了”，这就成了上乘的诗句。“打倒四人帮”，这完全是政治口号，按照孙绍振的操作方法，我即刻写成了这样的句子：“我挟着长江的万顷浪潮，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这就成了诗。“红军不怕远征的万险艰难，万水千山只是等闲之辈。”这谈不上是好的诗句，我根据孙绍振的写诗操作方法，改写成“马背上，春风秋雨；征途中，万水千山”，这就成了诗了。把复杂深奥的诗歌理论，变成具体的操作，这是孙绍振的创新，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在中国诗歌理论方面所见到的第一个尝试者和成功者。

孙绍振是我在华侨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的老师，他教我们写作课。华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水平不高，因绝大部分是来自印尼的华侨，中文程度很低，有的连讲话都表达不清楚，但学校教师的水平却相当高，其原因是六十年代新办的这所面向海外的新高校，考虑到政治影响、国际影响，专门从全国高校中挑选了一部分富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来从教。当时的校长是韦恂，是教育部副部长。孙绍振老师是这一批教师中的佼佼者。一九六二年夏，我从上海到泉州华侨大学报到，从福州到泉州的长途巴士上，孙老师恰同我同车，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戴副眼睛，对周边的人是不理不睬的，不苟言笑，看来十分高傲。从福州到泉州，长达10小时的车程，他只是低头看他的书，看累了，擦擦他那金边眼镜，对飞逝而去的树木望一望，又低头看他的书了。他身边有几个大行李袋，装满了他的书。自他任写作课老师后，我同他比较接近了。我知道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读过研究生，五七年曾差点被打成右派。由于他性格高傲，言行不羁，他得不到重视，更谈不上重用，他同系主任乐澄清有矛盾，是系里重点斗整的对象。他被委派当写作教师，也不过是协助批改作业，上课讲课的是一位庄中度老师。他也乐得轻松，看书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我知道他十分有才华，但施展不出，为他不平，叫屈。我常在课余去找他，向他讨教。那时，我受丁玲一本书主义的影响，我在写作《泥土的歌——论臧克家的诗》的论文。

我六七年华侨大学毕业，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包头一机厂工作。后来，听说华侨大学遭解散，教师上山下乡，不知所踪。孙绍振老师去了哪里，我也打听不到。七三年我调回福建漳州三中任教；从《福建日报》上读到了他的诗，知道他在福建师大任教，给他去了封信，联系上了。七五年还是七六年，我已记不清了，他带师大学生来龙溪地区实习，在漳州我家住了多天，我才知道他在华侨大学解散后被下放贫困偏僻山区所

受的种种磨难。文化界圈内的人说起孙绍振老师这个人，都说他傲慢，不易接近。其实熟悉他的人都了解，他有一颗童心，他热情似火，朦胧派诗人舒婷、顾城、北岛，是他八十年代的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把他们引领到诗坛，并同谢冕、刘登瀚先生一起，把这些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培育成蜚声中外的名人，舒婷还留在中国，北岛去美国，我女儿在美国加州大学上学，曾听过他的中文课。顾城是诗人顾工的儿子，去了新西兰之后，杀死了他的妻子与情人。我常对诗歌习作者开玩笑说“诗人同疯子就差一步”。他同我既是师生关系，又称兄道弟。他在我漳州的家里三四天中，天天我们长谈到深夜，谈他的遭遇，谈华大教师的遭遇，更多的是谈诗，谈他的诗歌理论。他的讲话，我作了记录，也留下了他的笔记，以及上面留下了他圈圈点点眉批的一些诗歌爱好者的习作。之后，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整理了一份文稿《谈诗的技巧》，近20万字，分八章。七九年赴港定居，我把稿子带出去了，三联书店、南粤出版社，我都走访了，他们对学术性的著作，不太有兴趣，毕竟在这声色犬马的社会，读者的面是窄的，出版社难以获利。

香港是一个市场经济十分成熟、高度发展的社会。一般的严肃文学都没有什么销路，有一本《香港文学》，登一些小说、散文、诗类的文章，是纯文学的，长期依靠政府的补贴。香港八卦周刊，声色犬马的报纸才能生存下来，才能挣大钱。《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壹周刊》、《东周刊》，大行其道，销路极好，老板日进斗金。我也利用关系，找到香港多家书店，老板对《谈诗的技巧》均无兴趣，有的同我开玩笑，如能写《谈性的技巧》，定能出书，并愿付出高稿酬。后来，波文书局的一位黄姓老板对出这本书有兴趣，答应出版，但没有稿费。我为了尽快出书，也一口答应。二十万字的原文交稿之后，却杳无音讯，一年之后，再去查问，黄老板说稿子

找不到了，丢失了。之后，黄老板也找不到了，他开在湾仔轩尼诗道上的原本十分火红的双开间书局也关门大吉了。因为没有留底稿，孙绍振老师如何使诗歌写作具有操作性的创造性理论或许永远被埋没了，好在我当时抽取其中的几个章节，发表在《镜报》杂志，总算他的睿智和才华，他对写诗技巧的成功尝试和探索，他的独创性的理论我们今天才有浮光掠影般浮浅的了解。

(三)

收录在本书第三辑的从商格言，共三十条。当时，上海侨办、侨联、侨报，正在联合编写一本《华商格言》，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侨商、侨领撰写从商生涯中的体会、心得，要求文字短小精悍，富于哲理。

侨办、侨联、上海海外联谊会这三个组织机构，我至今分不清楚它们不同的功能、作用。中国机构的重迭、反复，人员的冗杂、臃肿，是有目共睹的，我因是美国北加州上海联谊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因会务的事，也常去拜访，我同侨办侨联关系好，他们热情有礼，上海海外联谊会就不敢恭维了，记得二〇〇三年，美国北加州成立三周年，会长嘱我同上海海外联谊会联络，请会长黄耀金写一贺词，我打了多次电话，并转发了会长来的传真，但一位吴秘书就是敷衍推托。美国北加州上海联谊会，在美国是最大的一家华人社团，以上海人为主，它的宗旨是爱祖国、爱家乡、为会员办实事，应该说在美国的政治倾向是亲中国的。在美国三藩市有不少的社团，其中不少是亲台的，它们每年有台湾政府发经费，日子过得很潇洒。宴请吃饭，笑谈麻将。台湾政府需要时，举举手，表表态，亮亮青天白日旗。三藩市的亲中左派团体，其中哪些得到中国政府的经费，我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的社团靠的是会员的赞助，会

员的会费，没有靠中国政府一分钱，因此，生存得十分艰难。国内官员赴美的迎来送往，江主席、朱总理、胡锦涛书记等不少中国大领导人，抵美、离美，会里均派会员去机场接送，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我们均通过会员大力宣传。为搭建中美交往的平台，为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络，为中国在美的招商引资，每一个会员仿佛象一砖一瓦，砌进中美友好这座大厦。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热血华侨，他们无私地为祖国奉献着，为家乡奉献着，他们一颗颗赤诚之心，一腔腔殷殷之情，昭日月，泣鬼神，但上海海外联谊会竟然连贺词也不肯写，我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我是会长的秘书，这种程式化，公式化的贺词，我一天可以写完一百封。上海《侨报》原属侨办办的，现在听说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上海《侨报》有我不少朋友，如张敏女士、张春梅女士，都是极出色的编辑、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由于《侨报》早年没有加入上海的两大报业集团，现在由民间出资办报，举步维艰，经营困难。《华商格言》的策划、编辑、出版，是由侨办和《侨报》合作搞的，具体的操作是有王惠潮先生和张春梅女士负责。我谈不上是著名的侨商、侨领，只是白手起家，成功了一点小生意而已，我也不知该书的编辑怎么会看上我，或许我是文人经商，生财有道，是儒商吧。书出版之后，我才大吃一惊，我同香港巨富李嘉诚的儿子商业精英李泽楷并列书中。或许是我精于文学，通于哲学，连写带摘，我一下子交了30条格言，我出版过《我从商道路——葛新商业书信选》，发表过《教你做生意》、《中国文化传统的光辉照耀着我的从商道路》等演讲稿和论文。我也从中摘录了多条，连同新写的，共30条，交张春梅女士。我有位朱姓朋友，美国北加州苏浙同乡会会长，他说叫他写格言，他实在写不出，勉强凑了一条。编辑对我的厚爱，或许就是看中我的文化厚重。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振奋人心，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至

理名言。这些名言，短小精悍，富有哲理。字字沁入心脾，言言落入肺腑。论修德学向；论齐家接物，论敦品处事，论从政议政……这就是中国格言。在我的人生路上引领我在困难前不低头，在失败时不气馁，在胜利时不骄傲；在成功后不浮躁，正是千百年来千吟百唱的中国格言。各地出版的中国格言集琳琅满目，但是以《华商格言》为内容的专著应该说这是第一本，我不能不叹服顾训中先生、王惠潮先生、张春梅女士的慧眼。华商格言，主体是华商，反映华商在投资、经营管理历程中艰苦创业的精神、丰富多样的创业理念、蓬勃向上的精神境界，我选在本书中的三十条格言，内容面较广，既有传统格言的精神，如励志、勤奋、信心、谦虚、交友、读书等，更有对商业成功的高度概括，对时运命运的辩证总结，对生意规律的深刻揭示。如“人们习惯于谈生意，生意不仅是谈，更主要的是做。”这一格言，是我自身多年的商涯生活的科学总结，揭示了步入生意场内正确途径。这一观点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振人耳聩，发人深省。对初涉商场，迷恋于不着边际、崇尚高谈阔论的年轻人是一帖清醒剂和指南针。我在美国期间，有那么一帮上海人，其父母均有背景，有的是旧上海的大资本家，有的是失落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在美国总是不断地谈大生意，房产、金融、外贸，日日谈，月月谈，年年谈，几年来没谈成一笔，但又不愿做一点实事，出门西装革履；回到家里以咸菜肉丝面度日；其实，生意除了初期的谈判外，主要是做。以我从事的外贸来说，谈判好了之后，是签合同，寄样品，跑工厂，验货，发货，船运，银行结汇等，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是做生意。上海现在也是满天谈生意的经纪，成功的极少。

“读书，不要迷信他人，要学会分析。我读书是‘踩着书读’”这是我读书的科学总结。读书时要吸收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迷信他人。象目前书市铺天盖地的企业创新方面的书，其实对于欲从事小本生意的创业者来说，根本是不着边际

的。几千、几万元的小本资金，且不说什么创新，就是媒体上登几条广告，钱就花光了。我在美国成功的经验不是创新，而是“创旧”，是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我从事的是箱、包、袋、皮件产品，首先走访批发商，零售商，哪些产品好销，作市场调查，然后从他们处取走适销美国市场的样品，回中国后，我跑浙江，江苏这二个轻工业品制造大省，浙江的宁波、萧山、绍兴，杭州、嘉兴……江苏的苏州、昆山、南京、扬州、扬中，我都跑遍了。美国的进口商是从广交会上通过外贸公司购货的；而我直接同工厂购货，价格便宜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左右，然后，我以低价同这些美国佬去竞争，去抢夺市场，抢夺客户，我获得了成功，生存下来了。我还去大商店里买一些意大利皮件样品，拿到中国来，款式稍加变化，变成了自己的品牌，但它的售价只是十分之一的意大利品牌价钱，美国的普罗大众当然对价廉物美的我的产品青睐了。迷信书本容易犯错，前段时间被新闻炒作成为发财致富经典的《穷爸爸、富爸爸》等书，不知误导了多少的青年，怀着一夜发财的美梦，不少人辞弃了原本好好的工作，其结果是人财两空，连生存都出现了问题。

(四)

收集在本书第四辑的文章，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我已出版著作的序、后记，二，是有关紫砂收藏方面的文章，三，是一些写事写人的散文。

我已出版的书有《毛主席诗词笺释》、《港人医话》、《中日友好史话》、《鲁迅诗歌注释》、《周恩来诗歌注释》、《我的从商道路—葛新书信选》、《毛泽东诗词注释》等。在编这本诗文选时，我又重整理了一些原稿，我吃惊地发现，写《鲁迅诗歌注释》，我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写完全书，抄写的原稿，在桌上

堆成了小山。这种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学者的特点。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严肃的文化，真正的文学，已愈来愈少，我在二〇〇三年四月，由我组织举办的“中美文化现状比较与路向”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对中国文化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当今的文化是“浮躁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学，“美女作家”、“身体写作”、

“网络小说”、“手机文学”充塞文坛。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不少是为市场而写作，作品只追求畅销、赚钱。他们的文学作品的信息来源于网络、漫画、日韩的电视剧，完全是虚拟的；文学脱离了真实，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而我们的不少评论家，谁给钱，就吹捧谁，也没有了是非曲直的标准。有的评论家为了轰动效应，随意地把写作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学的高手金庸，捧为现代文学的巨擘、新文化的旗手；论资排辈，甚至排在鲁迅之前；而我们的一些大学的学者教授，也按捺不住做学问的寂寞，或下海淘金，或是兼职扒分，真正的学者，要做点学问也难，研究出书，要自掏腰包。一般的文、史、哲的大学教师，也只二、三千元的月工资，退休后的工资才一千多元。一位日本友人曾对我说这样的话：“今后中国人要学中国历史要去日本学”，事实是今天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成果，远大于中国的学者。前几年，作协、文联等文学组织、大学，还组织过一些历史、文学的研讨会，近几年是愈来愈少了，甚至销声匿迹。参加一次会的会务费多则几千，少则几百，真正的学者教授，严肃文学作家哪有余钱去参加这种研讨会，因此，即使偶然见到这种会，也成为沽名钓誉者利用公款酒酣饭饱之后的高谈阔论场所。我们的政府建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楼台亭阁，公款消费几百亿，几千亿。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整理、对严肃文学的倡导和培育、仅停留在口头上。现在不少名牌大学的文学系、历史系学生，他们毕业后选择的工作是企业策划、公关、营销等，而不再愿